

#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

周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

周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周锋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898-9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456 号

责任编辑 廉萍

装帧设计 赵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1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页 3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98-9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浙江树人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浙江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资助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科研基金资助

# 序

吴 晓

诗歌自产生以来,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抒情,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并由此形成了几千年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古人对此有所总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吟咏性情也。”我们不妨把这一阶段的诗学称之为“抒情诗学”或“情性诗学”。诗歌发展到了现代阶段,它所表现的世界大为拓展,诗歌的内容更加丰富,所要表现的人类的内心世界更加错综复杂和深入。传统的诗学理论已经不能胜任,更无法说明诗歌不断创新的实践本身,诗学观念亟待变革。随着现代诗歌的产生和发展,知性诗学应运而生。我认为知性诗学的提出,对于诗歌创作和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的存在不在于只是为了单纯地抒发情感,而在于建构一个作为艺术符号而存在的意义系统。纵观现代诗歌产生以降,有关概念如歧义、张力、复调、意图等等之类的命题相继推出,就是这一诗学观念萌生、壮大的表征,其对诗歌的本体把握,随之达到新的高度,诗歌真正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方式。因此我认为,作为一种客观的诗学存在,“知性诗学”是颇能概括现代诗歌艺术实践的重要诗学命题的。周锋的博士论文以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为选题,无疑是一个很有学术探索意义的举动。

情性诗学与知性诗学,并非截然对立、相互割裂的两种诗学。

它们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中有知知中含情，但后者作为在前者基础上的发展，它已发生了新的蜕变，其性质也已大大不同于前者。这里面既有众多的关联、包含、纠缠，又有诸多的变异、更新、拓展。因此，周锋的研究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知识谱系，需要相当的理论建构的勇气与眼力。而她明知这是一项诗学理论探索的长跑，仍有意地把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本体理论体系的建构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

知性，也称智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借助一系列“客观对应物”来暗示某种情绪、观念，即靠意象、场景等客观物来表达意义，其创作已然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抒情，使诗的意蕴更加丰厚。象征主义产生以后，诗歌也由一般的传达感情，转而进入表达意义的新阶段。周锋注意到了象征主义诗歌对于诗歌艺术的巨大变革，深刻认识到其对于知性诗学建构的开创性价值，因而她在文中特别说明：“象征主义发展到瓦雷里时，……象征不再仅仅表现一种与宇宙契合的情绪感应，而是重在从中辨析自身生存、人类精神、宇宙意识等形而上的思考。”可见她一开始对知性诗学的本质把握是准确的，也是深刻的。

知性诗学至今仍是一个较为模糊、有待厘清的学术概念，欲加以清晰框定存在难度，但周锋根据自己的感悟和研究，对这一核心概念，作出了自己的定义：“从诗学的角度看，‘知性’是由存在于直觉境界中的想象逻辑推出来的，说具体一点，‘知性’是由直觉想象激发的、对宇宙本体存在规律的一场领悟。知性形成的逻辑起点是感觉表象，基础是心灵综合。知性诗学的本体特征则要求主体通过以物及心、以心及物进行审美意象的创造和直觉境界的营构。”在这个定义里，她把知性诗学的心理机制、逻辑起点、本体特征概括得十分明确，对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把握得比较透彻。周锋有着自己执著的学术追求，她的研究应该是有其个性的。先前学界对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研究，看重的是西方知性诗潮在中

国现代新诗中的反响与传承,致使中国现代知性诗学成了某种西方诗潮、诗派独特作风的中国化。周峰不这样认为,她在兼顾了相关的影响研究的同时,把研究立场和视野落脚在中国自身的诗学实践上,把研究立足点落实在从1917至1949年间的全部主知诗歌上,不以个人或流派作为主知诗歌的定位标准,一切以诗歌主张和文本实际进行取舍。同时,周峰也找到了建构全书理论体系的切入方式,这就是心物关系。她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诗歌,无不涉及心物关系,知性诗学涉及的当然也是心物关系,而且是更为本质意义上的心物关系,因为现代诗学中的“契合论”、“心灵综合论”等等,其实讲的均是心物关系,而知性诗学的核心问题“契合论”就是一个涉及主体与客体即心与物的关系的命题。因此,她以心物关系为切入点,将中国现代诗歌的知性追求分为“以物及心的物感化知性追求”和“以心及物的意志化知性追求”两大类,同时结合主“智”与主“思”两种知性诗学形态,立足于中国新诗中主知诗的具体文本,来阐述不同的“心物关系”的建构及其对于作品的艺术品位的影响。“心灵综合论”方面,也将其分为“心灵综合的体验型知性追求”和“心灵综合的经验型知性追求”两类,把它作为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建构的基础工程进行深入的专题探究。这样,周峰就把心物关系与知性诗学两者打通,把握其内在关联,并找到了其最终实现的方式。本书中,作者着力探求与梳理的是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建构、发展与深化的历史进程,在“史”的动态描述中,概括出演变规律,以及各阶段在现代知性诗学建设中呈现出来的种种有益经验和有效途径。

任何学术研究,既需要学术勇气、学术个性,更需要作者的学术积累,个性归根到底来自于学术基础和功底。周峰对于中国传统及西方诗学理论资源的梳理,对于如“诗言志”、“契合”论、“诗是经验”等命题的辨析,均显示了她的学术功力,散见于全书的作品、文本的解读与阐释,更体现了她细读解悟的功夫与识见。当

然,相对于传统诗学,中国知性诗学从提出至今,学界的关注仍然是不够的,对于它对现代诗歌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也缺乏足够的挖掘和重视,深入而系统性的研究更觉阙如,随着现代诗的发展及诗学思考的深入,这一现状肯定会得到改变。周峰的研究,尽管仍有种种的不足,但无疑已为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光大落下了厚重的一笔。

是为序。

2013.4.30 于名仕书屋

## 目 次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传统继承与西方借鉴 .....	24
第一节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传统继承 .....	24
第二节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西方借鉴 .....	43
第二章 1920 年代中国现代新诗知性的滥觞与知性 诗学的发生 .....	91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新诗知性的滥觞 .....	91
第二节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理论的倡导与发生 .....	104
第三节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形式初探 .....	112
第三章 1930 年代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与发展 .....	120
第一节 现代派知性诗学建构的两种路径 .....	120
第二节 从心物契合看“兴”说与“比”说 .....	156
第三节 诗歌音乐性论争中的知性诉求 .....	159
第四章 1940 年代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拓展与深化 .....	165
第一节 九叶诗派艺术与现实合一的知性追求 .....	165
第二节 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 .....	172
第三节 关于“放逐抒情”与“新的抒情” .....	189

第五章 心物关系论:知性诗学的本体建构(一) .....	210
第一节 心物关系 .....	211
第二节 以物及心的物感化知性诗学建构 .....	225
第三节 以心及物的意志化知性诗学建构 .....	258
第六章 心灵综合论:知性诗学的本体建构(二) .....	280
第一节 心灵综合 .....	280
第二节 感性体验型心灵综合的传统知性追求 .....	300
第三节 心智经验型心灵综合的现代知性追求 .....	313
第七章 艺术探求论:知性诗学的本体建构(三) .....	335
第一节 组织结构措施 .....	336
第二节 语言经营策略 .....	353
第三节 节奏体式营构 .....	376
附录 站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 .....	394
结语 .....	412
参考文献 .....	423
后记 .....	440

# 绪 论

## 概念辨析

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受泽西方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其建构过程是一代中国学人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生存体验，将西方现代知性传统和中国古典知性传统融合的过程。

诗学是诗美创造规律的探求，知性诗学研究是探求知性诗的诗美创造规律。

首先来看知性这一概念。“知性”这一诗学范畴来自于西方，但这一提法在西方其实比较少见，它更是中国学者对中西方此类诗学追求的一种概括。1930 年代，高明译阿部知二（日）的《英美新兴诗派》<sup>①</sup>介绍了艾略特等“英美所谓现代派”的诗学理论，该文认为他们的态度是“非常主知的”，并将其源头追溯至 18—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兼批评家柯尔律治的“想象”理论和 19 世纪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对“智性”的追求。1937 年 1 月 10 日，柯可（金克木）在《新诗》第 4 期发表了《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一文，文中明确提出了“以智慧为主脑的诗”这一概念，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把新诗分为“智的”、“情的”、“感觉的”“三个内容方面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智”诗这一概念，明确提出这类诗的第一个特色是“以智为主脑”，也就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和“一般

<sup>①</sup> [日]阿部知二：《英美新兴诗派》，高明译，载 1933 年《现代》第 2 卷第 4 期。

人所提及想到的”、“以情为主的诗”“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是把主智的诗和抒情的诗划出了一道界限。第二，柯可认为：“主智的诗”与“旧的所谓说理的诗不同”，理由是“它并不是用诗的形式去说明一个道理”；同时也不是那种“容易使人因此联想到的卖弄聪明做警句的诗”，因为它“有时只是几句平淡无奇的话”，并且“也还不是普通认为兼哲学家的诗人所作的哲理诗”。<sup>①</sup>那么柯可所说的“诗的形式”是指什么？他说：

要使智慧成为诗，非使它遵从向来产诗的道路不可。……而诗的特色……也便要最直捷的一拍即合而不容反覆的绵密的条理。……我们不妨试去追踪一下这种智慧诗的出产。不用说作诗者先要有一些准备的功夫和技巧的修炼之类，等到他已为自己创造了适当的表现法（自然有时也可以是借来的），而且对事物人生宇宙的观察已有了成熟圆融又简单又普遍的结果时，这时他对于一切便有了一种诗人的了解。……这样蕴之既久，于是一触即发，发时如情，不能自止。……于是不得不以逻辑不能解说的诗的形式来表现出来。这种情智合一的东西便转化为可见可闻的形象或音响。……这种诗必然是所谓难懂的诗……懂的另一层意思是类似参禅人的悟道。此一偈来，彼一偈去，如来拈花，迦叶微笑。有人觉得这一下是当头棒喝，懂了，而别人也许还在茫然。<sup>②</sup>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蕴之既久”，“一触即发”，“发时如情，不能自止”，这说明智（知）性的传达是与主体对生活的体验分不开的，它往往伴随着一股情感的冲击力，往往需要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思想的重量。二、这一类“智慧诗的出产”必须遵循“向来产

<sup>①②</sup> 载 1937 年 1 月 10 日《新诗》第 4 期。

诗的道路”，也就是说，诗性智慧——知性的出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其“开初的诞生”与“后来的效验”，它的价值的实现过程，要遵循艺术的规范与约束，才能与读者结成审美共识关系。根据柯可对这一“出产的道路”的描述，本文认为：知性即在心物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对生命本体和宇宙规律的领悟，是对世界和人生内在意蕴“整体的把握”。<sup>①</sup>

在中西方诗学中，心物关系及其内在机制都是推动诗学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心物契合是把握知性诗学的命脉，中国现代知性诗学正是在心物关系的建构上，划出了与西方知性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界限。柯可的知性诗学之心物关系的建构，是一种以心及物的禅宗境界的体现。他认为作诗要有准备的功夫和技巧修炼，诗人必须“对事物人生宇宙的观察已有了成熟圆融又简单又普遍的结果时”，才可以说已有了一种“诗人的了解”，他对诗人的“心性”提出了高的要求，表现出对诗人内在主体人格超越性的重视。“蕴之既久”、“一触即发”是一种悟道的“内感”，而非外物之感。理学家程颐说得好：“寂然不动，万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则只是内感，不是外面将一物来感于此也。”<sup>2</sup>这里所谓的“内感”，是缘于“性与天通”的悟道，即柯可所说的“类似参禅人的悟道”。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还有另一种以物及心、身与物化的道家境界，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宗岱和唐湜的知性诗论。梁宗岱在《象征主义》一文中力图借对西方象征派的宪章——波德莱尔的“契合”论进行中国化的阐释，来建构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契合”理论。他引用了波德莱尔《契合》中如下诗行：

自然是座大神殿，在那里

<sup>①</sup> 吴晓：《诗美与传达》，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sup>②</sup> 程颐 程颐：《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活柱有时发出模糊的话；  
行人经过象征底森林下，  
接受着它们亲密的注视。<sup>①</sup>

他解释说：“即当作我们认识底对象，呈现于我们意识界的事事物物都要受我们底分析与解剖时那种主——认识的我与客——被认识的物之间的分辨也泯灭了。……老子底‘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引用到这上面是再确当不过了。因为，在这难得的真寂顷间，……一种超越了灵与肉，梦与醒，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同情韵律在中间充沛流动着。我们内在底真与外界底真调协了，混合了。我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sup>②</sup>这里透露的信息十分重要，即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契合”理论与中国“感物”的艺术感知方式和“神与物游”的美学传统存在着某种暗合之处，从心物关系的建构上看这是“以物及心”的物感化方式，只是从瓦莱里开始的后期象征主义者才转向“以心及物”的意志化方式。值得指出，学界在研究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问题时，其参照标准主要是西方后期象征主义以心及物的知性诗学建构。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知性”可以理解为在心物融合中对生命本体和宇宙本体的一种领悟或者直觉。“知性”作为一种诗性智慧，只有接受特定艺术惯例和程式的规范、约束，才能找到诗意传达的途径和方式。柯尔律治、艾略特、瑞恰慈的诗学理论的核心命题大都是围绕“想象”——一种“善于综合的神奇力量”来描述的。本书第六章重点围绕两类心物关系对中国新诗中知性诗创造规律进行探求。同时，在综合借鉴柯尔律治、艾略特、瑞恰慈的“想象”说、克罗齐的“直觉”说以及刘勰的“神思”说等诗学理

<sup>①</sup> 梁宗岱：《宗岱的世界》诗文卷，黄建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sup>②</sup> 同上，第147页。

论,在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心灵综合”<sup>①</sup>这一概念。所谓“心灵综合”即心灵的诸方面在诗歌运思过程中全面而系统的展示,必然会导致对感受着的世界某种存在规律——知性的领悟和把握。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受泽于传统和西方,我们有必要对中西方知性诗学话语中与“知性”这一范畴密切相关的概念作一介绍。

## 一、“契合”、想象力、直观与知性

一切仍从“契合”开始。“契合”论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同时也是西方现代知性诗学的核心范畴。在西方现代知性诗学中,同样存在两种类型的契合方式:以物及心身与物化的感物式契合和以心及物境由心生的意志化契合。前期象征派提出的契合论属于前者,后期象征派则属于后者。

西方现代诗学中知性的问题应该始于前期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的“契合”论的提出。如上所述,波氏的十四行诗《契合》(Correspondances)是“象征主义宪章”,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性诗学本体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梁宗岱和唐湜都从中寻找自己知性理论的支撑。早在1920年代,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诗人田汉首次从英译文本中移译了该诗。田汉的长篇论文《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1921)<sup>②</sup>中凸现波氏“契合”论,对“五四”文坛“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

① 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一书中从直觉的形成和作用出发提出了“心灵综合”这一范畴。他把直觉看成是一种心灵赋予本来无形式的物质以形式的心理活动,并将这种直觉活动称之为“心灵综合作用”,即综合“感受”、“印象”、“情感”来显示直觉活动。克罗齐的“直觉”探求的只是审美直觉本身,认为直觉即表现,缺乏创作心理活动本然存在的具体过程。

② 1921年8月21日脱稿于东京,载1921年11月《少年中国》第3卷第4、5期。

那么什么是“契合”？“契合”与“想象力”、“直觉”等范畴密切相关。

波德莱尔认为，“想象力是一种近乎神的能力，它不用思辨的方法而首先觉察出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契合的关系，相似的关系”，<sup>①</sup>诗人的想象力往往不表现为一种分析和推理，而是一种即刻的、综合的感觉，或者说一种与物融合的直觉。1930年代，高明译阿部知二（日）的《英美新兴诗派》<sup>②</sup>最早介绍艾略特等新批评派理论。在引言中，作者称 T. S. 艾略特为“新兴诗派的枢轴”，“艺术意义上的新的诗派”，而这“乃是英美所谓现代派（Modernists）”，又强调说，近代派的态度是“非常主知的”，阿部知二阐释说：

他们认为睿智（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即潜在意识的世界——这些黑暗之中，像探海灯一般地放射着睿智，而予这混沌的潜在的世界以明晰性，予这混沌的潜在的世界以方法的秩序，便是现代知识的诗该做的纯粹的工作。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循着顾立治和爱伦·坡系统，其特征就在其理论的，主知的，分析的态度，其诗之纯粹性，形式研究的深刻，和超自然的这一点。还有，近代派是作为在这系统之下的法国的诗人把坡尔·伐莱利仰作了他们的先辈。<sup>③</sup>

学界在探讨“知性”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最早引入的知性理论，坚持这样一种说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把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者所主张的一种知性作为参照标准。引文中提到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英美所谓现代派”是这一类主知的诗的代表，而他们

① [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②③ [日]阿部知二：《英美新兴诗派》，高明译，载1933年《现代》第2卷第4期。

的先辈则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坡尔·伐莱利、保罗·瓦雷里。综合起来看，不论是前期象征主义者还是后期象征主义者，他们对于知性理论的阐述都是围绕“契合”、“直觉”、“想象力”等概念进行的。当然，由于心物关系的不同，即使同为“直觉”，其内在的含义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知性”英文写作“intellectuality”，含有“智力”、“领悟力”、“思维力”等含义。西方哲学美学发展史中也存在“知性”这一范畴，西方哲学美学家赋予了它不同含义，但它们与我们所说的“知性”并非同一性概念。本文所说的“知性”与康德的哲学美学思想中“想象力”、“审美理念”等概念密切相关，值得一提。康德美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审美理念”：

我把审美理念理解为想象力的那种表象，它引起很多的思考，却没有任何一个确定的观念、也就是概念能够适合于它，因而没有任何言说能够完全达到它并使它完全得到理解。<sup>①</sup>

康德把“审美理念”描述为“想象力的自由游戏”<sup>②</sup>的表象。沈语冰在《美何以成为道德善的象征？》中引述这一观点并解释道：

由于展示在直观中意味着将它带至概念下，一个不可展示的直观就是那种不能完全由概念加以规定的直观。因此审美理念或许可以描述为由想象力在其自由游戏中产生的、不能被带至概念之下，至少是不能完全带至概念下的直观。康德审美理念的重要性在于：他将审美理念的形成与想象力的生产能力联系起来。<sup>③</sup>

这里审美理念系经由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而产生。“想象力的自

<sup>①</sup>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58—159页。

<sup>③</sup> 沈语冰：《美何以成为道德善的象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10页。